

雷蒙·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对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启示*

赵金平**

【摘要】共同文化思想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雷蒙·威廉斯的重要研究方向和终身思想追求。该思想认为，以承认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合法性为前提，社会应该构建起一种以平等性、参与性、差异性、动态性为基本特征，以“邻里友善原则”下的共同体为实现主体，以民主式传播和文化扩张为基本路径，遵循“自然生长与扶持”发展原则的共同文化。这一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协调处理多重文化关系；立足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关系，面向人类共同文化，引领人类共同文化，推动世界范围内共同文化构建。

【关键词】威廉斯；共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将共同文化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终身的思想追求。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威廉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上，对其共同文化思想进行专门的细致探析，尚显不足。本文试图梳理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揭示这一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

一 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为了对抗英国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在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并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领导干部信仰危机的哲学反思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CDJ021）阶段性成果。

** 赵金平，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对大众文化进行充分的合理性辩护之后，以其整体性文化观和唯物主义文化观为理论基础，威廉斯提出并阐释了他的共同文化思想。

（一）共同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威廉斯认为，随着工人阶级共同信念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通信和传播的发展及扩大，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共同文化”，所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都可能创造性地参与和共享文化，“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加以界定的。”^① 通过阐释其基本特征，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诠释。

第一，平等性特征。威廉斯区分了两种不同含义的平等与不平等——生命存在的平等和人类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威廉斯认为，生命存在的平等是唯一重要的平等。否认这一层面的平等是“邪恶”的，是在排斥其他人类、贬低其他人的人格、把其他人非人格化，会导致少数人名正言顺地否定或支配多数人的生活，其结果是容易引发残忍、剥削甚至残害。显然，共同文化所包含的平等内涵即生命存在的平等。否认生命存在的平等是与共同文化相矛盾的。对此，威廉斯表述说“共同文化在任何层次上都算不上是一种平等文化，但是共同文化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②

与此同时，人类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受欢迎的，需要加以鼓励。威廉斯举例说，比如在能力、知识、技能、努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一位物理学家不会自认比一位作曲家、棋手、木匠更优秀，更不会自认比一名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更优秀。如果认为共同文化将成为一种统一和一致的文化，那是批评家们的奇思妙想；如果因为那么多的人要取得一致意见困难得几乎不可能，那也是不必要的担心。可见，承认多元文化在内容上的差异，同时否认它们在审美价值、实用价值等方面的高低，共同文化内含的正是这样的辩证关系。

第二，参与性特征。在威廉斯看来，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意义来自他们的共同经验，来自他们复杂的总体表达。既然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主的，那么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有权利和义务积极参与到威廉斯所说的“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和扩展中来。“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就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③ 这是应然的层面。

① （英）雷蒙·威廉斯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43页。

② （英）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330页。

③ （英）雷蒙·威廉斯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4页。

从实然的层面看，划清界限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以所谓的“工人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说法为例。每一代人作为传统文化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可能单单是一个阶级的产物，即便是在一个特定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也是一样。确实，主导阶级在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分配中可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文化发展过程。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如何做出选择也往往与主导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其他各个阶级也都有可能在共同文化的创造中做出贡献，而且是独立做出贡献。也就是说，这些贡献可能没有受到主导阶级的影响，与主导阶级的文化并立而行；甚至站在主导阶级的反面，与主导阶级是对立的。在文化的继承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

威廉斯据此断言，历史上的文化创造是异常复杂的过程。曾经出现贡献不均等、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但从没有达到仅限于某个阶级做出贡献的程度。仅凭一种简单的阶级划分或标准划分的机械、化约、粗糙的方法，远远不足以对这一复杂过程进行充分解释。认为文化专属于某个阶级，忽略人类的共同遗产，从而自以为是地维护所谓的文化标准，是愚蠢的做法。共同文化就是“针对一种预定的或精英文化的概念而运用一种扩展中的、由多方一起参与的普通文化的概念。”^①

第三，差异性特征。共同文化的“共同”并不等于完全统一，或不可辨识。一方面，威廉斯考虑到，任何可以预测的文明都必然要依赖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那么如何在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共同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因技术专业化造成的体验的碎片化状态是否与共同经验、共同文化相矛盾？对文化的多样性参与是否会使得共同体成员之间产生疏离感？对此，威廉斯的解释是，由于个体的能力和精力的局限，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充分参与文化。而正是由于人们只能选取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参与，他们的选择和贡献必然都是千差万别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考虑到，我们进入的社会情况可能相当复杂。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占有文化财产，他们可能选择这个放弃那个，关注这个忽略那个。人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以统一的方式来共享文化财产。“如果认为共同文化就是所有人说着同样的东西，重视同样的东西，或者在通常对文化的抽象中，对这么多文化财产的平均占有，这样的看法是危险的。”^②

威廉斯断言，任何体制如果不能容许真正的灵活性，不能容许其他选择途径，都必然有所欠缺，“否定这些实际的自由便是烧毁了共同的种子”，“工人阶级运动中，虽然那紧握的拳头是一个必要的象征符号，但握紧拳头并不意味着不能摊开双手，伸出十指，去发现并塑造一个全新的现实世界”。^③可以说，这个比喻很好地

① (英) 雷蒙·威廉斯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75页。

② (英) 雷蒙·威廉斯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42页。

③ (英)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345页。

解释了共同文化中团结观念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为此必须肯定人类的个体性和多样性，这是实际的人性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文化也不能是一种简单的意见一致的社会，而且肯定也不是单纯的步调一致的社会。有必要在共同文化中留出空间，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种状况与共同文化是并行不悖的。有学者评论说，表面看起来，共同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概念，但这个“共同”绝非“同一”的意思，而是一种兼容了诸多“不同”的共同，它强调的是一种异质的和谐共存状态，而非一种同质的同一状态。^①这样的评价不无道理。

第四，动态性特征。即共同文化具有复杂性和机动性，它由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过程，没有最后确定性。共同文化不是一个结论，或者说不是绝对真理的栖居地。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把握这一动态性特征。

其一，无法继承——按照威廉斯的说法，共同文化不是整体继承而来的，而是在生活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或者换个说法，共同文化描述的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参与社会文化的创造，而不是用一个既定的、共享的世界观将所有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按逻辑关系来看，并不是共同文化在先，创造在后；而是创造在先，共同文化在后。从时间关系来说，共同文化寓于创造之中。

其二，不断调整——在威廉斯看来，我们所处时代的共同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大一统式的社会形式，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组织形态，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重新调整、重新规划。也就是说，共同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是社会所有成员在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中对其共同意义和价值体系的持续创造和重新定义的过程。

其三，没有终点——威廉斯认为，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过程是一个没有具体终点的进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这个进程已经最终自我实现。它总是被人们不断地制造着，并且不能以任何终结的意义被完成。文化革命与民主革命、工业革命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威廉斯所称的“漫长的革命”。

其四，不可预知——如果认为共同文化所指代的共同意义和价值可以事先规定，威廉斯认为，那是“既愚蠢又傲慢”的事情。因为如前所述，这些意义与价值是在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且经历着不断铸造与再铸造的过程，其铸造方式也是无法事先得知的。人们可以预测未来，那是“提出”某种意义，但是无法提前“进入”未来，或者以某种方式假定自己就是未来。

（二）共同文化的实现主体和发展路径

简言之，共同文化的实现主体是共同体。在威廉斯看来，有效传播是共同文化得以实现的途径，而共同体的存在是有效传播的基础。如果没有整体的经验，最先

^① 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第185页。

进、最巧妙的技术也无法完成真正的传播。针对一些大众传播的践行者试图借助应用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零星知识”来助力传播的做法，威廉斯认定，“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theory of community）。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它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或者以不完整的共同体为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互不相干”^①。也就是说，在有效传播中，共同体是基础、前提，处于决定性地位；而技术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在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

在威廉斯看来，作为共同文化实现主体的共同体，不是利维斯主义缅怀的共同体，或中产阶级宣扬的“服务观念”的共同体，或工人阶级秉持的“团结观念”的共同体，而应是一种“邻里友善原则”下新的共同体。威廉斯认为，这种共同体强调邻里关系、义务和承诺，其本质是广泛的、积极的相互责任，能够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威廉斯断言，“事实上，交流是我们社会的基本问题……如果交流是真实的，它必须依赖真实的共同体经验以及所有的交流渠道的畅通”。^②

可以看出，威廉斯的“邻里友善”的共同体原则与其倡导的共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一致的。按照威廉斯的主张，在技术专业化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往往只能选择性地、部分性地参与整个文化的创造，选择不同带来了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就要求人们之间相互负责，相互调整，使得自己的选择以及现实的不平衡与一个有效的文化共同体和谐共存。也因为技术专业化的不断增强以及人们选择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个人必须承认其他人的技术，承认不同技术之间的区别，共同体必须容纳变化，容纳异议。威廉斯用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共同体观念，从而对社会个体的归属和意义做出了新的解读。而这一新的共同体的核心就是共同文化，即一种民主、共享和平等的文化。

威廉斯认为，共同文化的发展路径包含三个必要因素。

第一，民主式传播。威廉斯认为，旧有的独裁式传播模式、家长式传播模式、商业式传播模式都具有支配性属性。为此，他提出了民主式传播模式的构想：民主式传媒属于整个社会；它是人类成长的记录，因此必须多样化；它依靠社会中最大限度的个体参与，而抛弃了以往认为传播是少数人教训、指挥、领导多数人以及传媒是控制别人或借以牟利的工具的观念；它必须不再使用来自美国的那些充满控制欲的术语（如将“人民”称为“受众”和“标靶”）；它的基础是普通民众。民主式传播是进行有效传播的根本解决办法，也是创造共同文化的必经之路。

第二，“自然生长与扶持”原则。威廉斯认为，旧有的支配性传播观念已经扩

^①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327页。

^② R. Hoggart and R. Williams, "Working Class Attitudes," *New Left Review*, No. 1 (1960): 26-30.

散和深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支配性氛围,大众被视为可以任意控制的客体存在,这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支配性氛围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业发展——人类主宰、控制自然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对自然的主宰观念使自然环境被孤立地利用,使其变得支离破碎,人类可能会很快获得效益,但却带来了长久的损耗。通过经验的体验,人类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一点,慢慢学着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关注。那么扩展到人类自身,人类如果被孤立地利用,最终结果只能是精神的荒废和文化的荒芜。为此,威廉斯提出,在共同文化的发展中,必须摆脱长期以来的支配性模式,重现建立起“自然生长与扶持”的原则(the 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这一文化发展原则主要强调以下论点:相对于支配性模式,这一原则倾向于认为文化是不可规划的;任何活生生的生活过程都是异常多样和复杂的;在按照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同时,必须承认他人的情感,并保持成长渠道畅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充分的生活;创造共同文化所需的自然生长观念与扶持观念是相互结合的:单纯强调前者,容易走向浪漫的个体主义;单纯强调后者,又是集权主义的典型。强调自然生长,是强调人类整体的潜在的文化创造能量;强调对自然生长的扶持,是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过程都是一种选择过程,是对它的一种肯定、强调和特殊扶持过程。共同文化的根本特性就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普遍的,重新选择也是自由的、普遍的;这种扶持是以共同决定为基础的共同过程。允许文化自然生长与对自然生长的扶持是一个互相协调的动态过程,为这一过程提供根本保障的基本原则就是生命平等的原则。

从共同文化发展路径——“自然生长与扶持”原则——的角度,我们再次把握到了共同文化的几个基本要点:其一,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文化;其二,共同文化不是某种既定的、现成的文化;其三,共同文化是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延伸”“传授”获得的;第四,共同文化不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如果说有“上”与“下”之分的话)。

第三,文化扩张。“文化的创造,比盗用它的社会精英所创造的要广阔得多,文化的传播,比这个概念所设想的要广阔得多。”^①基于这种认识,威廉斯主张,要实现共同文化,还是要在文化的创造范围和传播范围上做文章,也就是使这种范围更加宽泛,远远超过社会精英所言,从而实现一种文化扩张(culture expansion),即“精英文化大众化”。文化扩张的解决方案包括最大范围地发展读者大众、最大限度地推进公共教育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众传媒。威廉斯认为,这是艰难的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变迁一起形成了一场“漫长的革命”。

二 雷蒙·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威廉斯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与当代中国存在差异。由于语境不同,我们不应该也

^① (英) 雷蒙·威廉斯 《现代主义的政治: 反对新国教派》, 阎嘉译, 商务印书馆, 2004, 第274页。

不可能以“拿来主义”的方法直接“移植”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或者建构起与威廉斯所言完全相同的共同文化，也就是“复制”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然而，建构一种与之基本原则一致的、涵盖其思想合理成分的共同文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那么，结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状况，我们需要构建何种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其现实路径如何呢？本文从面向国内和面向世界两种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构建“共同文化”要协调处理好多重文化关系

本文认为，在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构建的“共同文化”应该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本内核，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创造，从而彰显其共同的文化理想、文化取向、文化态度的文化体系。相对于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文化。为了与威廉斯所言的共同文化相区分，本文使用带引号的“共同文化”一词。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共同文化”，必须协调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多重文化关系。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导地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经过长期发展，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拥有了多重文化身份。它既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因此写进《党章》之中，也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因此写进《宪法》之中；它既是大部分党员的个人信仰，又是一种主流的学术思想，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大批的研究人才。然而，除却以上四种身份状态，应该说，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方式恐怕仍处于不自觉、不充分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选择而确定下来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共同文化”的创建中，我们必须要坚持其在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以防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此，理论研究人员要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由深奥转化为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化为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共识，成为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并内化为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共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看，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成的、以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以基本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原则的统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构建起来的，因此更具时代性、现代性和科学性。

可以看出，“共同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所涵盖的内容上有交叉重

叠。相比之下，“共同文化”更加强调和突出文化的多元性和共同性特征，其范围也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宽泛，但其构成成分中最重要的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共同文化”的最核心、最精华部分。无论我们创建何种意义上的共同文化，这都是我们必须坚持而须臾不可轻视的。

第三，吸收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优秀成分，推进传统文化时代化。经过上下五千年的积淀，中华民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共同生活其中，我们的各种活动和行为在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被其深深地影响。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是文化血脉，我们要建构“共同文化”，必然要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吸吮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展现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特质。

那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不是直接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共同文化？显然不是。按照威廉斯的理论，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哪种意义上的共同文化，都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不间断的动态过程。共同文化不是整体继承而来的，而是在生活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它描述的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参与社会文化的创造，而不是用一个既定的世界观将所有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因此，原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显然不直接是我们要创造的共同文化，因为它是既有的、已经完成了的。此外，传统文化毕竟来源于“传统”，是在多种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的长期浸染下生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胎记。其中的腐朽落后的成分，我们是不应该带进新时期文化建设中来的。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只有经过过滤和筛选、改造和重建，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共同文化”的构成要素。

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也持基本一致的态度。我们要创建一种共同文化，就不能故步自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吸取人类一切文明积淀，包括东方和西方不同区域、历史和现实不同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

第四，以精英文化引领大众文化，努力提高大众文化层次。如前所述，在论及共同文化的发展路径时，威廉斯将文化扩张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策略，并主张这种“扩张”要通过公共教育的深化、读者大众的发展、大众传媒的改革来实现。简而言之，威廉斯所倡导的文化扩张，其目的是把与少数人相联系的、被少数人所掌握的精英文化延及大多数人，使之成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从而让大多数人也能享有文化带来的益处。威廉斯还主张，人民大众不仅具有消费或享有文化的权利，也具有创造文化的权利，是文化创造不可或缺的主体。享有文化也好，创造文化也好，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宗旨是主张将“以大写字母 C 开头的文化”转变为“以小写字母 c 开头的文化”，即取消将文化界定为面向少数人的专有名词的用法，使文化成为民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肯定大众文化在“共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和消解精英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什么是精英文化，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但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是精英文化的最主要代表，应该不会引发异议。那么很显然，大众文化代替不了精英文化，同样后者也替代不了前者。在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以精英文化引领大众文化，努力提高大众文化层次，推进精英文化大众化，恐怕应该是“共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文化，无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共同文化”都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种优秀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它应该保留多元文化的各自优势，在相互融合中形成具有更大发展潜能的新的统一体，并在不断的生成和发展中实现整体文化的进步。

（二）构建“共同文化”要面向普遍性的世界文化

从国内的文化建设拓展开去，从更加宏观的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按照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论，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自然生长”中，经过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共同扶持，必然也会逐渐迈向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那么，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还是积极迈向威廉斯所说的共同文化的发展方向呢？

事实上，这涉及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本文认为，要回答上述坚守文化特殊性还是迈向文化普遍性的问题，首先要认清三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文化发展之路，往往是抵抗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一种防御策略。这是因为，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控制手段和途径比较起来，文化所蕴含的控制力量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被征服”的案例十分常见。古罗马用暴力征服了希腊，希腊先进的文化反过来改变了罗马；中国清王朝由满族入侵中原而建立，其结果是满族被逐渐汉化。这都说明，相对于暴力手段，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也就是说，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综合国力相差悬殊的发达国家的文化攻势，如果不强调民族文化特殊性，往往容易使民族文化失去根基，甚至导致民族文化的迷失、被同化，甚至消亡。然而，强调文化特殊性的文化发展策略虽有其益处，但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是一种防御手段，因此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病，最突出的即容易造成文化的封闭、保守，甚至自我循环、止步不前，其后果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体系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其二，当前，我国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范畴，然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和沉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初步奠定，中国力量、中国声音不断增强。整体来看，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处于主动地位，在某些

问题上甚至越来越多地发挥主导作用。简而言之,如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变得日益“坚挺”,被同化的危险逐渐减弱。

其三,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物质生产、文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生产、共同创造、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文化融合。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研究者所言,“在丰富多样的民族和地域的溪流中,有着共同性和一致性的主航道。”^①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不可逃避的历史潮流,也反映着人类的整体性进步和提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逃避文化普遍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偏安一隅,既不正确,也不可能。

从以上事实分析可以看出,从文化特殊性角度来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反映和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特质,是民族自立、自主的根本依据所在。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殊性的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得以传承而不被中断的根本标志,是须臾不可放弃的。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一味坚守民族文化特殊性,又不免使本国文化趋于保守和落后。马克思在其《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曾将当时的中国比喻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②,这样的比喻至今听来仍然不觉使人汗颜。可以说,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为文化建设面向文化普遍性准备了条件。因此,本文认为,在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特色”的同时,冲破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人类共同文化,引领人类共同文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的构建,既是我们促进本国文化发展进步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文化软实力、争取文化话语权的必要途径,也是我们履行大国文化义务和责任,为世界范围内构建人类共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的应有行为。

当然,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既不应该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宣扬和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的文化,也不应该是西方世界所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框架内的文化,而应该是针对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吸取和融合各民族文化优秀元素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更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更能够提升人类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更具有创造性、人本精神和科技理性,更能够表达人类共同的生存价值、理想、历史意义、终极关怀等深层次追求的先进文化。

需要强调的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迈向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并不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固有之物,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

^① 张奎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深远意义》,《哲学动态》2013年第10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2页。

展、不断进化的过程。无论对其形成过程还是发展过程来说，开放、兼容并蓄、善于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并注重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无论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对待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式的拼凑，而是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总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在面向国内还是面向全球的视野中，我们都可以借鉴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启示作用，更好地确定我们的文化发展思路，处理我们的文化关系，制定我们的文化策略。

Implications of Theory of Common Culture by Raymond Willia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Jinpi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ommon cultural is the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life-long pursuit of Williams, the core figure of British culture Marxism. The theory holds that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e as an integral lifestyle as well as the legitimization of common culture, the society is expected to construct a shared culture with the basic features of equality, involvement, difference, and dynamics. It is taking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eline of goodwill as the goal, taking the democratic spreading and cultural expansion as the elementary path and abiding by the tenet of natural growth and mutual support. This theory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at is, to deal with multiple cultural relationships guided by Marxism, to face common human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to lead human common culture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wide common culture.

Keywords: Williams; Common cultur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